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23年6月19日至7月14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贫困的性别不平等：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方法

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概要

在本报告中，工作组重点关注了侵犯妇女和女孩多项人权的系统性失败所导致的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工作组从性别层面分析了贯穿各领域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并审查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导致、延续和加深妇女和女孩贫困和不平等经历的结构性和驱动因素。它提请注意，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和方法，在准确捕捉、衡量和解决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对妇女和女孩权利和实质性平等的影响方面是有缺陷的，并强调了存在有希望的替代方法。

在向各国、国际组织和公司提出的建议中，工作组坚持认为，亟需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重新界定为全球关注的问题，需要在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交叉方法指导下，对其采取综合对策。



目录

	页次
一. 活动.....	3
A. 会议.....	3
B. 国家访问.....	3
C. 信函和新闻稿.....	3
D. 其他活动.....	4
二. 专题分析：贫困的性别不平等：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方法.....	4
A. 背景框架.....	4
B. 对妇女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采取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办法.....	7
C. 性别不平等和国际人权：免于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权利.....	9
D. 基于人权的女权主义经济：实质性平等、团结、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	15
三. 结论和建议.....	17
A. 结论.....	17
B. 建议.....	18

一. 活动

1. 本报告涵盖工作组自提交上次报告¹至 2023 年 3 月以来的主要活动，并包括一项讨论贫困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专题分析。

A. 会议

2. 2022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工作组在纽约召开第三十四届会议，会上与民间社会组织举行会议，讨论未来的立场文件，并把本专题分析作为侧重点。工作组还会见了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的代表、老年人享有所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国家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以及会员国的代表。

3.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4 日，工作组在日内瓦召开第三十五届会议，会上会见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科室的代表。专家们还会见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和受教育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工作组与来自不同地区的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人士举行了虚拟磋商，以受益于他们在贫困妇女和女孩问题上的经验和专门知识。

4. 2023 年 1 月 16 日至 20 日，工作组在日内瓦召开第三十六届会议，会上与各区域的活动人士，包括女孩和青年妇女活动人士，以及重点关注贫困妇女和女孩的区域人权机制代表举行了虚拟磋商。工作组会见了人的安全股代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性别问题协调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鉴于人权理事会第 51/20 号决议授权编写联合报告，工作组受益于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阿富汗问题工作队和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进行的讨论。工作组还会见了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以及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最后，工作组会见了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和会员国的代表。

B. 国家访问

5. 工作组于 2022 年 4 月 4 日至 15 日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并于 2022 年 9 月 11 日至 22 日访问了马尔代夫。工作组对两国政府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工作组鼓励各国积极回应工作组的访问请求。

C. 信函和新闻稿

6. 工作组单独或与其他任务负责人联合向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发出几封信函。这些信函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歧视性立法和做法、对妇女人权维护者的

¹ [A/HRC/50/25](#).

权利受到侵犯的指控、性别暴力以及侵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的行为。² 工作组还单独或与其他任务负责人、条约机构和区域机制联合发布了新闻稿。³

D. 其他活动

7. 2022年7月18日至22日，工作组在曼谷举行了一次区域会议。专家们莅临该区域，通过就本报告举行磋商等途径，为加强其在东南亚的网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工作组会见了联合国各区域实体的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代表、亚太论坛成员以及泰国外交部和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的代表。与民间社会组织就该区域妇女和女孩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的磋商使工作组受益匪浅。

8. 专家们还开展了其他许多活动，包括参加区域协商和专家会议，以及与作为工作组成员身份的利益攸关方进行接触。⁴ 特别是主席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作了口头报告，并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发言。从2023年2月1日起，工作组开始主持消除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独立专家机制平台，⁵ 并积极促进全球和区域妇女权利机制之间合作的加强，途径包括发表联合声明和为各区域民间组织开展能力建设。

二. 专题分析：贫困的性别不平等：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方法

9. 工作组感谢所有利益攸关方为编写本报告做出的重要贡献，其中包括回答问题卷、提交证明文件和参加区域和专题磋商。

A. 背景框架

10. 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匮乏或财富匮乏的结果。它由极其明显的系统性失败所致，造成排斥和歧视的恶性循环，侵犯今世后代的公民、文化、经济、环境、政治和社会权利。⁶ 2022年，妇女和女孩占全球人口的49.7%，⁷ 但在世界穷人所占比例却过高。全球预测显示，2022年，估计有3.88亿妇女和女孩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相比之下，男子和男童的数字为3.72亿)，其中83.7%位于两个区域：撒哈拉以南非洲(62.8%)和中亚及南亚(20.9%)。⁸ 极端不平等也有所加剧，自2020年以来，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攫取了近三分之二的新财富，几乎是世界最底层99%人口的两倍。⁹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全球粮食、能源和照护

² 见 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GWomen/Pages/Communications.aspx.

³ 见 <https://rb.gy/7add>.

⁴ 见 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GWomen/Pages/Activities.aspx.

⁵ 见 <https://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wg-women-and-girls/edvaw-platform>.

⁶ E/C.12/2001/10, 第8段。

⁷ 《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结果摘要》(联合国出版物，2022年)，第6页。

⁸ 妇女署、开发署和帕迪国际未来中心，“根据最新预测，妇女和女孩的贫困加剧”，2023年2月1日。

⁹ Oxfam International, *Survival of the Richest: How We Must Tax the Super-Rich Now to Fight Inequality* (2023).

危机，反过来又与包括武装冲突、占领和被迫流离失所在内的其他危机相关联，导致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首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加剧，¹⁰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和女孩尤其受到影响。¹¹

11. 妇女和女孩所经受的不平等和贫困，源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在历史上持续作出的经济政策选择。这些政策优先事项并非不分性别，因为它们是在男权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经济制度和机构中发展起来的，后者忽视女孩和妇女的具体经历和权利，同时把男性和企业的权力作为主导形式，使现有的等级制度永久化。¹² 贫困和不平等是结构性现象，对人民、社区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阻碍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崩溃以及其他全球性挑战，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武装冲突、经济衰退以及移民、粮食和照护危机带来的生存威胁。

12. 国际经济机构和各国政府的政策反映出，过去四十年来不断转向新自由主义的作法，明显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困和不平等。¹³ 这些基于父权制、奴隶制、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破坏环境的不平等现象，因正统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加剧，这些政策包括旨在抵消国家重债¹⁴的结构调整和紧缩措施¹⁵、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市场的金融化，¹⁶ 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和财政制度、¹⁷ 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以及福利国家的隐退。¹⁸ 虽然分析这些现象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但必须指出，全球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猖獗，其特点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主要是男性)、少数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司手中，这减少了可用于促进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政策、服务和方案的资源。¹⁹

13. 贫困是一种性别现象，与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歧视深度交叠。妇女和女孩的贫困经历，与其种族、族裔、移民身份、年龄、残疾、宗教、地理位置、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因时、地而异的不同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从家庭到社区，在企业 and 所有公共权力部门，影响妇女和女孩各生活领域的歧视性规

¹⁰ 见 <https://sdgs.un.org/goals/goal10>.

¹¹ 见 [A/HRC/38/46](#); <https://data.unwomen.org/>; 妇女署，“乌克兰危机对能源获取、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全球性别影响”(2022); [A/HRC/26/39](#); [A/HRC/32/44](#); 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措施不应忽视妇女和女童”，2020 年 4 月 20 日；消除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独立专家机制平台，“COVID-19 大流行与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和歧视行为的增加”，2020 年 7 月 14 日。

¹² Frances Raday, *Economic Woman: Gendering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Capital* (Routledge, 2019).

¹³ Jason Hickel, *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8); 另见 [E/C.12/2001/10](#).

¹⁴ 见 [A/77/169](#).

¹⁵ Oxfam International and Nawi-Afrifem Macroeconomics Collective, “The assault of austerity: how prevailing economic policy choices are a form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2022).

¹⁶ Gender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Briefing: making trade work for gender equality” (July 2017); 和 Alicia Ely Yamin, *When Misfortune Becomes Injustice: Evolving Human Rights Struggles for Health and Social Equal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¹⁷ Oxfam International, *Survival of the Richest*.

¹⁸ 见 [A/HRC/44/51](#).

¹⁹ Focus 2030, “Overview of data resources on gender equality across the world”, 3 March 2023.

范和有害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持续存在，助长了这些不平等的维持和深化。²⁰ 最近对性别平等原则的攻击和反弹突出表明，亟需重申人权框架和交叉的女权主义方法在解决贫困和贫困造成和巩固的不平等方面的中心地位。²¹

14. 长久以来，大多数国际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一直是如何将妇女和女孩更有效地融入现有的不平等经济体系，而不是挑战和改造这些体系，使其促进和保护每个人的全部人权。²² 因此，许多解决贫困女性化问题的干预措施采用了一种狭义的贫困概念，即贫困仅仅是缺乏经济资源，而且这些措施还倾向于将妇女视为一个同质群体。²³ 主流减贫战略不是挑战和改变交叉形式的不平等，而是可能进一步强化本质上的性别陈旧观念和由此产生的结构性不平等。²⁴

15. 在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危机时期，对安全保障采取的主要做法，其范围也很狭窄——将人权搁置一边，因此对妇女和女孩造成了过大的影响。如果从整体上理解基于人权法的安全保障²⁵，将会优先预防和应对妇女和女孩面临的日益加剧的贫困和不平等风险。在这方面，COVID-19 危机除了起到加剧现有不平等的作用之外，还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包括如女权主义者多年来呼吁的那样，承认护理在我们社会的中心作用，以及重新评估国家(而不是市场)作为界定公共政策并为其提供资源的行为者的地位。因此，此时此刻为重新审视无限经济增长概念提供了一个机会，此一概念的基础往往是各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跨国经济不平等、不履行援助与合作的国际团结义务，以及没有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网络，或这些网络不足以保障普遍公认的人权，如健康、水、住房、粮食和营养、教育、清洁和健康的环境以及诉诸司法的机会。

16. 至关重要的是，贫困和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它们由结构性歧视所致，这种歧视反映在法律和政策的设计上，助长了当前和历史上的不公正。²⁶ 倡导从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权利的角度进行变革的社会运动，强调了全球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反馈循环，并提请人们注意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和体制的替代办法。²⁷ 对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这些基于权利的女权主义方法提供了关键的见解、工具、问责措施和补救办法，从而能够确定、挑战并克服造成贫困和不平等的结构性决定因素。

²⁰ 人权高专办，“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是应对全球危机和实现繁荣的关键”，2022年11月24日。

²¹ 见 A/HRC/38/46；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性别平等与性别反弹》(2020年)。

²² 工作组磋商期间发表的意见。

²³ Naila Kabeer, “Gender equality, the MDGs and the SDGs: achievements, lessons and concer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6 October 2015.

²⁴ Sylvia Chant, “Women, girls, and world poverty: empowerment, equality or essentialism?”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vol. 38, No. 1, pp. 1–24.

²⁵ 例见大会第 66/290 号决议，第 3 段。

²⁶ 社发所，《不平等的危机：为新的生态社会契约转移权力》(2022年)。

²⁷ Lucie E. White and Jeremy Perelman, eds., *Stones of Hope: How African Activists Reclaim Human Rights to Challenge Global Pover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另见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球倡议以及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网的报告。

B. 对妇女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采取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办法

17. 从概念上讲，本报告中采用的对妇女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女权主义方法，其基础在于重申妇女在法律、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政治领域以及所有生活领域的实质性平等。虽然性别平等本身是一项人权，且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与人权框架相关联，但女权主义方法增加了对父权制度和结构如何助长歧视妇女和女孩行为的批判性分析。²⁸ 对贫困和不平等采取基于人权的办法强调，各国和其他责任承担者必须尊重、保护和履行以下核心原则，即参与、问责、不歧视和平等、赋权和实施公平的规范框架，以保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充分享有所有人权。²⁹

18. 大多数关于性别和贫困问题的主流方法，都侧重于与工作、金融普惠和妇女创业相关的少数经济权利，而忽视了对实现其他许多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人权起决定作用的更广泛背景，而这些人权对于实现实质性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消除贫困至关重要。³⁰ 女权政治经济学家和民间社会运动强调指出，这种片面的消除贫困的方法，掩盖了从剥削妇女、女孩和边缘化社会群体以及自然环境中获益的体制和结构的作用。³¹

19. 在侧重于家庭层面数据的全球和国家发展框架中，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标准化衡量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生成、分配和消费方面基于性别的不平等。³² 工作组收到的许多材料强调，关于贫困和不平等，缺乏可靠的、多层面和多部门的分类数据。³³ 这一领域的研究、法律和政策往往没有体现贫困妇女和女孩的生活经历和声音。

20. 除了对性别问题不敏感和不了解之外，大多数全球贫困指标都倾向于衡量处于财富和收入最底层的 10% 人口状况的相对改善，而非着眼于最富有的 1% 人口所拥有的巨大收入和财富份额。³⁴ 衡量绝对不平等的常用方法，如基尼系数、百分位比值、帕尔马比率、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和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衡量方法，都侧重于需要采取有效政策，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³⁵

21. 针对妇女贫困问题，许多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注重的都是提高妇女个人的经济生产力，而非分析在家庭、社区、机构和市场内产生和复制不平等性别关系的

²⁸ 例见 Oxfam, “A feminist approach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inequality framework” (2021)。

²⁹ 见《关于极端贫困与人权的指导原则》；和 [E/C.12/2001/10](#)。

³⁰ Josephine A. Odera and Judy Mulusa, “SDGs,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hat prospects for delivery?”,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Human Rights*, Markus Kaltenborn, Markus Krajewski and Heike Kuhn, eds. (Springer, 2020), pp. 95–118.

³¹ 性权利倡议、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亚太分会和妇女发展权利协会向工作组提交的材料；和社发所，《不平等的危机》。

³² 见 [A/HRC/44/40](#)。

³³ 丹麦人权研究所提交的材料；土耳其开放空间协会深度贫困网络；Ginette Azcona and Antra Bhatt, “Inequality, gend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asuring feminist progress”, *Gender & Development*, vol. 28, No. 2, pp. 337–355.

³⁴ 社发所，《不平等的危机》。

³⁵ 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所，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2022年6月30日)。

权力体系。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没有承认并重视妇女的无酬照护、家务和农业劳动，而这些活动对经济起到支撑作用。它们忽视了妇女作为照护的提供者所面临的时间匮乏和时间“枯竭”等重要问题，³⁶ 以及护理链全球化，如家庭佣工或保健工作者移民，造成较贫困国家护理资源流失的问题。³⁷ 它们也没有考虑妇女和女孩接受促进性别平等的护理或进行自我护理和集体护理的权利。³⁸ 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选择和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包括多边经济机构推动的解决方案，往往会吸纳或瓦解变革性的经济议程，并对世界各地不同妇女和女孩群体的人权产生毁灭性影响。³⁹ 正如参加磋商的一名妇女所言，“我们不是穷，我们是正在变得赤贫”。

22. 女权主义者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正义的建议，呼吁实施基于人权以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综合概念的进程和原则，以替代基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⁴⁰ 这些对更平等世界的愿景，通过支持与不同的社会群体建立女权主义的和跨运动的联盟，促进包容性地民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质性平等和跨部门办法。它们还侧重于为所有人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从过度消费、生产和开采转向公平的全球贸易秩序、税收和债务公正、企业问责制和实现发展权。⁴¹

23. 一些社会运动正在倡导女权主义和非殖民化的全球绿色新政，这将需要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分配和重新确认，投资于照护部门，并对全球公共资源和商品进行重新构想，以使其得到公平和可持续的利用。⁴² 女权主义的工人联盟还参与制定替代性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将促进无害气候的工作，包括社会照护方面的工作，强调适当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等工作中的基本权利，通过全球社会保护团结基金实现全民社会保护，强调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实质性平等，以及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议程。⁴³

³⁶ Beth Goldblat and Shirin M. Rai, “Remedying depletion through social reproduction: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frame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Gender*, March 2020.

³⁷ Rosalba Todaro and Irma Arriagada, “Global Care Chains”, in *Companion to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Nancy A. Naples, ed. (Wiley, 2020).

³⁸ 拉加经委会，布宜诺斯艾利斯承诺(LC/CRM.15/6)；和拉加经委会，护理协会(LC/CRM.15/3)。

³⁹ 妇女发展权利协会，“性别影响投资和虚假解决方案的兴起：女权运动分析”（2023年）。

⁴⁰ 民间社会和土著民族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关系机制，“来自基层的声音 2：全球系统性粮食危机的变革性解决方案”（2022年）；和 Susan Paulson, “Degrowth and feminisms ally to forge care-full paths beyond the pandemic”, *Interface*, vol. 12, No. 1, pp. 232–246.

⁴¹ 税收正义全球联盟及其他组织，《构建女权主义税收》（2021年）。

⁴² 女权主义经济正义促进人民和地球行动网，“女权主义和非殖民化的全球绿色新政”（2021年）。

⁴³ Juan Pablo Bohoslavsky and Francisco Cantamutto, eds., *The IMF and Human Rights: Interviews* (2021).

C. 性别不平等和国际人权：免于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权利

24. 必须把免于贫困和不平等的权利视为一项多层面的公民、政治、社会、环境和文化权利，而不仅仅就经济剥夺而言。⁴⁴ 在磋商期间，工作组听取了许多利益攸关方的意见，这些意见有关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交叉性不平等如何以贯穿各领域的方式塑造和强化了妇女和女孩的不同贫困经历。

25. 国家和其他经济行为者的作为和不作为产生、促成和延续了贫困，而不能通过连贯和有针对性的政策解决结构性和系统性的不平等，则会进一步加深贫困。⁴⁵ 自 2013 年以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建立的个人投诉机制所产生的判例，强调了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同时也提请注意对贫困者的系统性歧视和污名化。⁴⁶

26. 区域人权机制也推动制定免于贫困和不平等权利的规范性框架。区域机构的重要贡献包括：采纳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和“有尊严生活的权利”这一综合概念，将基于贫困和弱势社会经济地位的歧视定义为侵犯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權利，确定对社会经济权利的直接侵犯，⁴⁷ 免受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的权利，承认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隔离造成歧视性工作条件和贫困，⁴⁸ 以及建立所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包括妇女获得粮食安全、健康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的可诉性机制。⁴⁹

27. 人权机制通过阐释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扩大了对贫困和不平等的理解，认为贫困和不平等是对多项人权的侵犯，属于有损人类尊严的结构性暴力形式。⁵⁰

享受平等和不歧视的权利

28.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八条规定，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 international 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在法律面前和根据法律

⁴⁴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A/77/157](#)；和 Jackie Dugard and others,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s Human Righ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0).

⁴⁵ [A/HRC/21/39](#), 第 5 段。

⁴⁶ López Albán 诉西班牙([E/C.12/66/D/37/2018](#)), 第 10.1 段。

⁴⁷ 例见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贫困与人权报告》(2017 年)；美洲人权委员会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特别报告员；美洲人权委员会，《工商业与人权：美洲标准》(2019 年)；美洲人权法院判例法，尤其是 2017-2022 年；拉加经委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关于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区域协定》(2018 年)。

⁴⁸ 见欧洲委员会，《欧洲社会宪章》(修订本)(1996 年)，第 30 条；Aoife Nolan, *Protecting the Child from Poverty: the Role of Rights in the Council of Europe* (2019)；和欧洲委员会，“欧洲大学妇女联合会决定：概况介绍”(2019 年)。

⁴⁹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2003 年)，第 15、18 和 19 条。

⁵⁰ 磋商期间发表的意见。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A/77/157](#)、[A/HRC/35/29](#)、[A/HRC/44/51](#)、[A/77/136](#) 和 [A/HRC/50/28](#)。

获得平等保护的人权要求责任承担者承担积极义务，减少个人权利持有者层面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⁵¹

29. 所有的核心多边人权条约和多数国家的宪法，均保障人人享有平等和不受歧视的基本权利。这一原则也贯穿于对所有人权的解释和实施。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包括不因性别、社会经济条件或其他身份等被禁止的理由而受到任何区别对待的权利。⁵² 人权法承认，歧视，包括交叉歧视和多种形式的歧视，既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原因，也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后果。⁵³

30.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载有关于实质性性别平等权利的多项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对歧视妇女的广泛定义、加速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的暂行特别措施、确保妇女充分发展、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以及享有特定社会经济权利的义务。⁵⁴ 该《公约》第五条(a)款规定，各国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打击有害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

31. 在工作组磋商期间，与会者——其中几人本身就是生活贫困的妇女和女孩或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妇女和女孩——描述了贫困妇女和女孩所经历的耻辱和交叉性歧视。来自少数族裔群体的妇女和女孩，如罗姆人和土著妇女、残疾妇女和女孩、贫困女孩和年轻妇女、文盲妇女和女孩、非洲裔妇女和女孩、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特别是无证移民)、无国籍、寻求庇护和难民妇女、生活在冲突和占领局势中的妇女、农村妇女、老年妇女、自营职业妇女、女性家庭佣工、捡垃圾的妇女和街头女摊贩，描述了贫困和不平等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她们的生活。许多与会者有力地证明了必须以有限的资源为其家庭提供适当的生活水准所带来的压力，以及由于不得不让其子女长时间从事低薪、非正式和危险的工作而产生的负罪感。⁵⁵ 与会者还强调，针对贫困家庭的社会福利范式，往往针对土著和少数群体，如罗姆人家庭，将他们的子女交由他人照料或未经双方同意进行收养，这是歧视性的，侵犯了家庭获得保护和援助的人权。⁵⁶

32. 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对妇女和女孩施用刑法的比例过高，原因在于她们的经济或社会地位，以及诉诸正式司法系统的费用。特别受到影响的是以下几类人：寻求包括堕胎在内的生殖保健和服务的贫困妇女和女孩，土著、移民和少数民族妇女和女孩，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女孩，做街头摊贩的妇女和女孩，性工作者、吸毒者或与毒品贸易有关联者，从事非正规经济的妇女，非正规和跨境贸易商，妇女和女孩环境和人权维护者，以及 LGBTIQ+社区成员。⁵⁷

⁵¹ Gillian MacNaughton, "Is economic inequality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Poverty*, Martha F. Davis, Morten Kjaerum and Amanda Lyons, ed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1).

⁵²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1款；《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20号一般性意见(2009年)；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11段。

⁵³ [A/HRC/21/11](#).

⁵⁴ 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十一至十四条。

⁵⁵ 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提交的材料。

⁵⁶ 终结儿童贫困联盟和青年之声提交的材料。

⁵⁷ 国际刑法改革和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以及 [fortifyrights.org](#) 提交的文件。

33. 对于生活贫困的妇女和女孩，土地或住房保有权的保障以及诉诸法律和司法系统的机会亦受到严重限制，她们往往没有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也无法对非法或不公平的驱逐、因发展项目、土地掠夺和环境破坏而造成的搬迁提出质疑或获得赔偿，或者获得或要求适当的住房、体面的工作条件或社会保障方面的应享权利。⁵⁸

贫困和不平等：侵犯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34. 许多国际、区域和国家人权文书均承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儿童权利公约》第 27 条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四条所保障的适当生活水准权是一项关键权利，通过这项权利，可以保障妇女和女孩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中指出，“适当”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气候、生态和其他条件”，不能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普遍的货币门槛。适当生活水准权包括粮食和营养、住房、电力、水和卫生设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四条和《儿童权利公约》第 30 条所保护的休息和闲暇权利对妇女和女孩也至关重要，她们往往受到时间匮乏的严重影响。各国义务立即采取步骤消除歧视，确保人人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所有人权的“最低限度核心”，并遵守逐步实现的原则，这意味着实施可靠的制度，以衡量在所有人充分实现这些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

35. 存在一些具体的、相辅相成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贫困和不平等对妇女和女孩充分享有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产生影响。例如，近年来，粮食和营养无保障方面的性别差距继续扩大，世界上有 31.9% 的妇女和女孩经历中度或严重的粮食无保障，而男子的这一比例为 27.6%。⁵⁹ 在获得粮食和营养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与分配生产用地权利方面的歧视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妇女在农业土地所有者中所占比例不到 15%。⁶⁰ 性别歧视还体现在法律、政策、社会规范和陈旧观念中，这些法律、政策、社会规范和陈旧观念限制了妇女获得种子和其他自然资源、农业投入和劳动力的权利，并使男子的营养需求优先于妇女和女孩的营养需求。⁶¹

36. 关于适当住房权，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女孩更有可能沦为性暴力和其他形式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而家庭暴力是造成妇女和女孩无家可归的主要因素之一。⁶² 缺乏关于无家可归妇女的全球数据，但在一些地区，18 至 29 岁和 64 岁以上的无家可归妇女人数急剧增加。⁶³ 住房不足也是一种性别现象，女户主家庭更有可

⁵⁸ 同上。

⁵⁹ 粮农组织和其他机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改变粮食和农业政策的用途，提高健康饮食的可负担性》(罗马，2022 年)。

⁶⁰ 粮农组织，“土地权方面的性别差距”(2018 年)。

⁶¹ 粮食和营养权全球网络，《粮食和营养权观察：妇女在粮食斗争中的力量》(2019 年)；民间社会和土著民族机制，“来自基层的声音 2”。

⁶² [A/HRC/43/43](#)。

⁶³ 穆尔西亚大学法律诊所与 Cepaim 基金会一起提交的材料。

能在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下生活，负担不起水、电和煤气，而且常常负担不起公共交通费用。这种情况对移民妇女尤为严重。⁶⁴

37. 月经贫困对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构成侵犯，对世界各地的大量妇女和女孩而言，它仍是一个重大关切，而那些无家可归妇女和女孩的情况尤为严重。在提交的材料和磋商中，人们注意到，在某些国家，大多数妇女和女孩买不起卫生巾和其他经期用品——有些人通过“卖淫求生”来获得这些用品，对经期用品征收消费税和增值税的政策加重了月经贫困。⁶⁵

38. 对贫困妇女和女孩而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中承认的健康权的许多核心要素，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健康环境权，也经常遭到侵犯。关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全球数据显示了巨大的区域不平等和国家间不平等，低收入国家的贫困妇女和女孩死于妊娠、分娩和不安全堕胎引起的可预防并发症的可能性，比高收入国家的妇女高 70%。⁶⁶ 贫困妇女和女孩，特别是残疾妇女和女孩以及移民或少数民族妇女和女孩，不太可能获得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常规癌症筛查服务，她们往往也负担不起基本的药物。⁶⁷ 卫生保健系统内这些形式的直接和间接歧视构成了基于性别和贫困的对健康权的侵犯。

39.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至第八条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一条保障的工作权利包括享有同工同酬和体面工作条件的权利。工作权可以使妇女免于贫困，提高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决策权，并使她们能够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行使更大的自主权。⁶⁸ 有人在工作组的磋商中重申，在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中，妇女和女孩继续因怀孕和照护责任而遭受结构性性别歧视。⁶⁹ 还有人强调，不平等和不充分的报酬、不稳定的就业、缺乏工会代表以及工作场所的暴力和骚扰，都是增加性别不平等和加深妇女和女孩贫困的因素。向工作组提交的材料强调了在当地和移民家庭用工中持续存在类似奴隶制或契约奴役的情况，以及这些做法如何促使妇女和女孩继续处于贫困和受剥削的境地。工作组收到的其他许多材料则侧重于特别经济区和出口加工区工作的剥削性、不稳定性和性别隔离性质，在这些地方，跨国公司受益于税收优惠，但未能充分尊重和保护工人的人权，其中大多数工人是青年妇女。⁷⁰ 记录疫情对妇女权利有害影响的研究突出表明，制造业部门因危机失去了大量工作，主要是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工人所拥有的工作，这些工人的边缘化社会身份加剧了他们的阶级劣势”。⁷¹

⁶⁴ 同上。

⁶⁵ 土耳其开放空间协会深度贫困网络提交的材料。

⁶⁶ 世卫组织，《2000 年至 2020 年孕产妇死亡率趋势：世卫组织、儿基会、人口基金、世界银行集团和经社部/人口司的估计数字》。

⁶⁷ 穆尔西亚大学法律诊所与 Cepaim 基金会一起提交的材料。

⁶⁸ [A/HRC/44/51](#)。

⁶⁹ Shirin M. Rai, Benjamin D. Brown and Kanchana N. Ruwanpura, “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a gendered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13, January 2019, pp. 368–380.

⁷⁰ 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问题论坛提交的材料，“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特区中女工的状况”。

⁷¹ 社发所，《不平等的危机》，第 180 页。

40. 在获得资金、资产和数字网络方面，国家和区域内部以及国家和区域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数据显示，女性拥有银行账户的可能性比男性低 9%，她们在储蓄、信贷、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领域也受到歧视。在中低收入国家，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女性人数比男性少 3 亿。⁷² 这些不平等对于女性企业主，特别是电子商务部门的女性企业主有重大影响，对她们获得工资和社会保障付款的能力也有重大影响。

享受身体自主和完整的权利以及免受一切形式暴力的权利

41. 1995 年《北京宣言》中承认的身体自主权包括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及自由，以及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这对于确保妇女和女孩能够平等行使免于贫困的权利至关重要。⁷³ 缺乏有效防止暴力行为的措施以及剥夺性自主和生殖自主权，不仅剥夺了贫困妇女的人格完整权，还阻碍了她们平等参与公共生活、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并阻碍了创业和其他创收活动。

42. 对于贫困妇女和女孩来说，身体自主和完整的权利在许多方面受到损害。虽然在确保获得避孕商品和服务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全球仍有 1.64 亿妇女的计划生育需求未得到满足；这些妇女和女孩大多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⁷⁴ 生殖健康服务和产品的私有化，使低收入妇女和女孩难以负担，从而延续了代际贫困。⁷⁵ 此外，如上所述，寻求避孕商品和服务或堕胎护理的妇女和女孩被刑事定罪，极大地影响了那些没有资金前往其他管辖区获得这些服务的人。⁷⁶ 强迫绝育的做法，特别是强迫少数民族和土著妇女，包括被剥夺自由的妇女以及残疾妇女绝育，也是贫困妇女和女孩遭受交叉歧视和暴力的结果。冲突、占领、气候变化和灾害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和贫困，导致辍学、性暴力和性剥削、强迫婚姻和童婚、早孕和意外怀孕以及贩运妇女和女孩现象增加。⁷⁷

43. 因此，贫困和性别暴力，包括性暴力和剥夺身体自主权，在恶性循环中相互作用，相互加强。面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家庭暴力或街头暴力的妇女和女孩无法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这反过来意味着她们在缴费型社会保障福利方面也受到歧视，且更有可能在老年时经历贫困、暴力和无家可归。⁷⁸ 当妇女和女孩无法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信息、商品和服务以及包括堕胎在内的计划生育服务时，基于性别的性别不平等和贫困就会进一步加深，并可能传给后代。⁷⁹

⁷² 世界银行，“性别问题中的世界银行”，2023 年 4 月 6 日。

⁷³ 见 A/HRC/47/38。

⁷⁴ 《2022 年世界计划生育状况：满足不断变化的计划生育需求——按年龄和方法分列的避孕药具使用情况》(联合国出版物，2022 年)。

⁷⁵ 土耳其开放空间协会深度贫困网络。

⁷⁶ 磋商期间发表的意见。

⁷⁷ 国际律师所和世界穆斯林大会提交的材料。

⁷⁸ 穆尔西亚大学法律诊所与 Cepaim 基金会一起提交的材料。

⁷⁹ 世界穆斯林大会和国际律师所提交的材料。

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利

44.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以及几项劳工组织公约所保障的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利，通过使所有人获得适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获得粮食和营养、住房、水和卫生设施、能源以及健康和教育的权利，在消除贫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利包括有权“不受歧视地获得和保持现金或实物福利”，以免受缺乏与工作相关的收入、负担不起的医疗保健和家庭支持不足的影响。⁸⁰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4 以及全球关爱联盟呼吁所有国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以及通过再分配政策，承认、重视、减轻和再分配无酬照料和家务工作，将其作为实现性别平等的关键机制。劳工组织关于产妇保护和有家庭责任的工人的各项公约和建议，以及劳工组织《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是有益的进步。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保护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估计全世界有 41 亿人没有享受任何福利，其中没有得到保护的大多数人是非洲区域的老年妇女。⁸¹

45. 虽然近几十年来，社会保护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且 COVID-19 危机表明，许多国家是可以迅速实施福利计划的，但大多数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对性别问题不敏感。大多数社会保护计划缺乏对性别问题的敏感认识，这表现在它们将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和条件排除在外，没有为家庭暴力相关伤害提供假期和福利，没有为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担任照护者或接受照护者的妇女和女孩提供支持，并规定能否领取福利取决于权利持有人的婚姻和正式就业状况，或取决于妇女无法获得的特定文件。⁸²

46. 国际人权法要求各国和其他责任承担者建立公平和可持续的制度，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用于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护制度，且各国和其他责任承担者也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做出了这样的承诺。⁸³ 这些资金应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采用累进所得税和财富税以及最低公司税起征点；债务重组；开展顾及性别平等和儿童问题的预算编制工作；游说扩大发展援助和转让。⁸⁴

47. 参加工作组磋商的许多人提出与获得社会保障应享权利相关的基于性别和贫困的歧视问题。⁸⁵ 残疾妇女和女孩、移民、难民、来自少数民族和土著社区的妇女和女孩经常成为交叉形式“福利污名”的目标，这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阻碍符合条件的接受者要求获得其应享的权利。

⁸⁰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2008 年)。

⁸¹ 劳工组织，《2020-2022 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社会保护处于十字路口——追求更美好的未来》(2021 年)。

⁸² 磋商期间表达的意见。

⁸³ Isabel Ortiz, Matthew Cummins and Kalaivani Karunanethy, “Fiscal space for social protec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ptions to expand social investment in 187 countries”, Extension of Social Security Series, No. 48.

⁸⁴ 世界银行集团，《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世界银行集团：弥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缺口》(2019 年)。

⁸⁵ 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提交的材料。

D. 基于人权的女权主义经济：实质性平等、团结、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

48. 免于贫困的权利若脱离个人和集体的实质性平等权利，是无法实现的。⁸⁶ 这一进程的核心部分，是不同的妇女和女孩群体有意义地参与社会经济政策、规范和战略的构思、实施和监测。面临的挑战是把不歧视从保护个人权利的手段，转向实现相关的再分配义务，这些义务也是国际人权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实现。⁸⁷

49. 实质性平等的权利要求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调动和重新分配资源。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其第二条，以及其他人权保障，各国负有义务“尽最大能力”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其中包括逐步实现人权的落实并为此目的寻求外部资源的积极义务。⁸⁸ 当下时刻危机重叠，为审查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人权方面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机会。各国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条，根据《发展权利宣言》以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的框架内所作的承诺，要求富国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人人不受歧视地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并合作减少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⁸⁹

税务正义

50. 如上所述，若想履行减少性别不平等和贫困的人权义务，各国必须将充足的公共资源用于全面的社会保护制度和服务。资源再分配的一个关键机制是采用比例税和累进税。过去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标志之一，是大公司和高收入者的财政贡献减少，而具有递减分配影响的间接税，如增值税，却有所增加。⁹⁰ 除了直接税减少之外，跨国公司的非法资金流动使全球南方国家每年损失高达 2000 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而未能有效遏制逃税、进出口伪报、腐败和洗钱意味着，可用于公平社会和气候支出的公共资源减少。⁹¹

51. 递减税制框架和非法资金流动都对妇女和女孩产生了特别恶劣的影响，由于结构性歧视，她们在贫困人口中所占比例更大，且比男性更有可能负责照料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成为被照料者，因此更需要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⁹² 国家和全球的税务正义是实现人权和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和贫困的重要机制，因为政府需要财政收入，以便可持续地在公共服务、社会保护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⁹³ 女权主义的财政改革方法强调需要透明的、促进性别平等的税

⁸⁶ Morten Kjaerum, Martha F. Davis and Amanda Lyons, eds., *COVID-19 and Human Rights* (Routledge, 2021).

⁸⁷ 社发所，《不平等的危机》。

⁸⁸ Margot E. Salomon, “Why should it matter that others have more? Poverty, inequality and the potenti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LSE Law, Society and Economy Working Papers, No. 15.

⁸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3 号一般性意见(1990 年)，第 13 段。

⁹⁰ Bohoslavsky and Cantamutto, eds., *The IMF and Human Rights: Interviews*.

⁹¹ 见 A/77/169.

⁹² 税务正义全球联盟及其他组织，《构建女权主义税收》。

⁹³ A/HRC/29/31 和 A/HRC/26/28。另见 Radhika Balakrishnan, James Heintz and Diane Elson, *Rethinking Economic Policy for Social Justice: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Human Rights*.

务框架，这一框架承认妇女在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并公平地重新分配来自最富有公司和个人的资源，为公共供应提供资金。⁹⁴

取消债务

52. 取消债务是公正和基于人权的再分配公共政策的先决条件。2021 年，在低收入国家，债务偿还额是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保护总支出的 171%，2022 年，全球低收入国家的偿债额估计为 430 亿美元。⁹⁵ 如果任其发展，COVID-19 大流行危机后广泛而持久的债务危机有可能使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少推迟十年。⁹⁶

53. 对于债务，存在不会造成不平等加剧的替代模式，现在的模式采取紧缩和财政整顿措施，导致社会支出减少，并已证明会损害贫困妇女和女孩的人权。近年来，有 60 多个国家成功地对债务进行了重新谈判，20 多个国家拖欠或拒绝偿还公共债务，宁愿将节省出来的偿债额投资于社会方案。⁹⁷ 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20 国集团的暂停偿债倡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灾难控制和救济信托基金，为重债穷国提供了一些偿债减免。此外，在一些国家背景下，有可能提出了数据，说明紧缩措施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其他权利的负面影响，以维持保障这些基本人权的方案和预算。⁹⁸ 这些干预措施为对话开辟了空间，讨论特定国家的债务和财政整顿对人权的影响，特别是就教育、卫生和营养等部门而言，但在取消债务和采用系统的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和财政程序方面，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这将使各国政府能够为制定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经济政策开拓空间。⁹⁹

公平、透明的贸易和投资体系

54. 关于贸易自由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与性和性别相关的不平等和贫困，这一点尚不清楚。在全球和区域贸易制度中，有人试图从“性别角度”看待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但很明显，这些进程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解决妇女作为企业家和小企业主的角色问题，而是需要采取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方法，以分析贸易和投资协定的人权影响，并按性别和其他歧视轴心进行分类。¹⁰⁰

55. 许多最近的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包含对性别平等和改善贫困妇女状况的序言承诺，在某些情况下包含关于性别平等的具体章节；然而，由于缺乏数据，不知这些承诺是否给妇女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善。¹⁰¹ 区域贸易一体化为非洲、

⁹⁴ Akina Mama wa Afrika 和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A feminist tax justice handbook for wo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2021).

⁹⁵ Oxfam, “First crisis, then catastrophe” (2022).

⁹⁶ 见 A/75/164.

⁹⁷ Bohoslavsky 和 Cantamutto, *The IMF and Human Rights: Interviews*.

⁹⁸ 在磋商期间表达的意见。

⁹⁹ Ilene Grabel,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progressive feminist agend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1, No. 4 (2022), pp. 331–345;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性别平等主流化战略” (2022 年)。

¹⁰⁰ 磋商期间表达的意见。

¹⁰¹ 贸发会议, “让贸易协定为性别平等服务: 数据和统计数字”, 政策简报, 第 81 期(2020 年)。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妇女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创造的许多工作报酬低且不稳定，没有为妇女提供发展增权赋能职业的机会。¹⁰² 性别平等条款往往不涵盖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或经济特区内的贸易，也不包含对违反此类条款的问责和争端解决机制。

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种族和社会不平等的赔偿

56. 人们正在把气候赔偿作为女权主义全球绿色新政的一部分进行讨论，该新政将确定责任归属，并界定殖民国家为历史上和当前的开采以及对全球排放的贡献所应支付的费用。¹⁰³ 通过这些进程建立的基金可用于制定创新和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更宽泛地说，赔偿应遵循恢复原状、补偿、满足、康复和保证不再发生的人权标准，¹⁰⁴ 并且是促进性别关系变革、符合国际人权法的。¹⁰⁵

公司问责制

57. 虽然政府是确保所有人权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主要责任方，但企业行为者也有责任尊重和保护人权，并为其活动造成的人权损害提供适当补救。¹⁰⁶ 企业通过维持人权、环境保护、劳资关系和财政问责制方面的标准，在减少全球和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方面可发挥关键的作用¹⁰⁷。最近制定了几份指导文件，强调企业有责任确保其活动推进实质性性别平等的权利。¹⁰⁸ 在实践中，参加工作组磋商的人指出，企业经常不支付基本生活工资或同等工资，或不提供社会保障，包括带薪产假或护理假，许多企业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工人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其他身体自主和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或确保妇女的集体谈判权和结社自由。与会者还强调，针对企业相关侵犯人权行为建立的企业尽职调查程序和申诉机制对性别问题缺乏敏感认识，更不用说促进性别关系的变革了，因此，在改变歧视性规范和做法方面基本无效。¹⁰⁹

三.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58. 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是消除贫困有效行动的先决条件，对此一直没有给与充分的重视。国际人权框架提供的工具，可以衡量和理解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

¹⁰² 贸发会议，“从发展角度看贸易和性别关系：概述”（2022年）。

¹⁰³ 女权主义经济正义促进人民和地球行动网，“女权主义和非殖民化的全球绿色新政”。

¹⁰⁴ 《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

¹⁰⁵ 见 Ruth Rubio-Marin, “The gender of reparation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in *The Gender of Reparations: Unsettling Sexual Hierarchies while Redress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Ruth Rubio-Marin,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¹⁰⁶ 见 A/HRC/8/5.

¹⁰⁷ 亚太经社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商业举措：加强证据基础，不让一个人掉队”（2021年）。

¹⁰⁸ A/HRC/41/49; A/HRC/41/43; 和人权高专办，“解决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人的歧视：商业行为标准”，2017年11月。

¹⁰⁹ 见 A/HRC/41/43.

和经济规范和机构如何正在系统地侵犯妇女和女孩免受贫困和不平等生活的权利。人权文书还载有重要的再分配和团结义务，这些义务若能得到充分执行，各国以及其他责任承担者将能够产生可持续的、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经济。

59. 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采取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方法，其基础是主张经济的作用在于支持人的尊严、福祉和人权。注重妇女人权，特别是妇女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她们参与生活所有领域的权利，这样的女权主义人权框架有助于纠正具体形式的结构性歧视。这需要审查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家庭内部动态、获得资产(包括共有资产)和对资产的控制、环境保护、时间分配、护理和福祉以及妇女和女孩的休息和休闲权，它们是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这种方法还提请人们注意，国家和其他行为者有责任采取有针对性的步骤，解决权力、资源和应享权利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并促进集体和个人的人权，包括发展权。各国和国际组织采取基于人权和女权主义的视角，从而创造进步的、再分配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这对于全面有效地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至关重要。

60. 应进一步发展免于贫困和不受基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歧视的权利，将其作为主要的人权，并应建立适当的系统，收集关于不平等和贫困的多层面分类数据。确定并有效应对基于贫困、性和性别、种族、族裔、年龄、能力、宗教、地理位置、移民身份、性取向、性别认同和其他条件的交叉和多种形式的平等，必须成为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参与性和有针对性政策和战略的优先事项。

61. 必须分析重叠的不平等以何种方式驱动和加剧生态、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并确保消除贫困政策旨在谈判达成新的基于人权的女权主义生态社会共识，从而转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鉴于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最后期限正在迅速临近，并注意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1、5 和 10 的进展缓慢，必须重申妇女和女孩的人权和性别平等，对于消除贫困进程和减轻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至关重要。

B. 建议

62. 各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实现国际公认的妇女和女孩的全部人权，以消除贫困和实现实质性平等，特别是通过以下途径：

(a) 根据适用于每项具体权利的人权规范和标准，将所有法律和政策，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法律和政策，建立在以下核心人权原则基础之上，即平等和不歧视、妇女和女孩有意义的参与、问责制，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逐步实现和不出现倒退；

(b) 保证提供普遍的、可获得的、充分的、可用的、促进性别平等和全面的社会保护，遵守和适用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并确保在妇女和女孩的整个生命周期，作为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一部分，给予其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护，不论其婚姻状况、就业或是否参与“正规的”劳动力市场；

(c) 确保平等的土地、住房和财产权，实现获得粮食和营养、水和卫生设施、健康、免费或负担得起的优质和可获得的教育、儿童保育、保健和老年人护理、体面工作的权利和工作中的权利，包括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以及妇女和女孩参与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所有领域的权利；

(d) 采取措施，防止和应对妇女和女孩作为社会保护受益人受到的交叉歧视；

(e) 根据国家、社会和性别平等分担责任、平等、普遍性和自主权的原则，确认和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综合监管框架、政策和方案，以实现护理权，这包括提供和接受护理以及行使自我护理和集体护理的权利；

(f) 通过资金充足的公共服务、福利制度和经济权利的落实，实现妇女和女孩身体自主和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确保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信息、服务和商品的有供应、可负担且能获得，包括解决月经贫穷问题，以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和应对性别歧视和暴力；

(g) 开展促进性别平等的资源再分配，途径包括承认照护经济价值，公平的财政政策(包括对高收入者和公司征收比例税和累进税)，公平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在国家破产情况下取消或减免债务，以及采取公司问责制；

(h) 确保实现贯穿各领域的权利，例如诉诸司法，包括对侵犯社会经济权利的行为诉诸司法，发展权和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

(i) 确定危机、复合形式的结构性歧视和法律、政策框架以何种方式使妇女和女孩面临更大的贫困和不平等风险并导致人权遭受进一步侵犯，预防、减轻和应对这些风险；

(j) 采用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方法来衡量交叉形式的歧视，以确保对贫困采取基于性别、以平等为中心和可持续的发展方法，更加关注本报告中确定的被高度边缘化和处于受排斥状况的妇女和女孩群体；

(k) 废除或修改将某些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这些行为与贫困和赖以生的活动、行使包括堕胎在内的性自主权和生殖自主权、以及对贫困和边缘化妇女和女孩具有过大影响的其他身份罪有关；

(l) 保障女工在工会和集体谈判中的平等代表权和发言权，并建立独立、透明的申诉机制，以保护和实现妇女获得体面工作的权利，使妇女能够享有这些权利，并在受到侵犯时获得促进性别关系变革的补救措施；

(m) 确保贸易和投资谈判和立场是透明和参与性的，其目标旨在消除性别、贫富和其他方面的偏见，符合并促进国际人权义务和《2030年议程》。这包括在制定贸易和投资协定和政策时，各类妇女在代表性和参与程度方面都实现性别均等。在缔结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之前，应进行性别和人权影响评估，落实这些评估的结果，并就此类协定的性别平等和人权条款建立争端解决机制；

(n) 遵守消除歧视的直接义务，保障所有最低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并逐步实现这些权利；将最大限度的可用资源用于为所有妇女和女孩实现、提供和获得这些权利；建立和促进使这些权利在法律上得到充分承认并可由法院审理的机制，包括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这两项公约的任择议定书；

(o) 特别是对经济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而言，履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援助和合作义务，采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适

用标准规定的基于性别和人权的方法，并促进通过一项关于发展权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将其作为重要的再分配机制；

(p) 重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作出的全球承诺，途径是采用创造性的、女权主义的和基于人权的战略，例如本报告第二节 B 小节中概述的战略，以及通过特别侧重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5 和 10 的国家指标。

63. 国际和区域经济、金融和货币机构及其成员国应：

(a) 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摒弃以增长为中心的、助长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采用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方法，把消除贫困和基于性别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作为优先事项；

(b) 设计、构建和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以实现妇女和女孩的人权和性别平等，增加普通预算中的供资，使用性别预算工具，采取补贴、援助、发展合作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贷款和融资等措施，并建立预算问责机制；

(c) 采取包容性的女权主义办法和方法，在设计、制定和执行国家、区域、国际各级的经济、社会法律和政策时，确保不同妇女和女孩群体的参与，并与其进行协商，确保决策机构中的性别均等，听取并重视替代形式的知识，包括经济领域的替代形式知识，以期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

(d) 定期收集和公开传播所有关键指标的分类数据，特别是与注重贫困和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 1、5 和 10)相关的数据，并特别关注性别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包括针对妇女和女孩人权维护者和环境权利维护者的行为。确保使用有效且兼容的方法进行汇总和分析。尽可能根据可能导致愈发边缘化的交叉身份，进一步分列数据；

(e) 查明和改变针对妇女和女孩、某些特定群体和国家的隐性和显性财政偏见，途径是分配预算以减少交叉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采取税务正义措施，查明和打击企业行为者的避税和逃税行为以及腐败行为。国家预算和经济政策中必须充分纳入性别和人权影响评估，以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必须承认照护经济的价值，并利用财政政策，通过注重性别平等的、可以确保对促进妇女和女孩权利及性别平等的政策进行充分投资的税收制度，减少和重新分配工作量；

(f) 对贫困和不平等采取全面的、促进性别平等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应涵盖各种不同的经历，超越注重财富和收入衡量标准中最底层 10% 人口状况的、相对不平等的常用门槛，并综合处理人口中最富有阶层拥有的收入和财富。这种衡量标准应该是交叉性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并强调实现在特定背景下与妇女和女孩适当生活水准权相关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

(g) 鉴于有大量证据表明，结构调整和偿还国家债务对妇女和女孩的人权具有不平等的影响，因此应就其制定促进性别平等和基于人权的宏观经济政策规定，并将其纳入主流。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和经济改革影响评估应考虑债务国及其债权人对借款国人口的人权义务，包括禁止执行或推动对妇女产生过度影响的债务和宏观经济政策。

64. 公司以及对其行使管辖权和控制权的国家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应：

(a) 按照《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促进实现所有妇女和女孩的权利，实施参与性的性别和人权影响和尽职调查进程，并确保对工商业相关侵权行为的投诉机制和补救是可利用的、有效的并能够促进性别关系的变革；

(b) 通过遵守人权和财政承诺及义务，确保企业问责制和税务正义，并执行《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性别问题指导，跨国公司和高利润公司尤应做到这一点。各国应将女权主义和基于人权的方法纳入国家行动计划和其他关于工商企业与人权的国家后续机制的主流。
